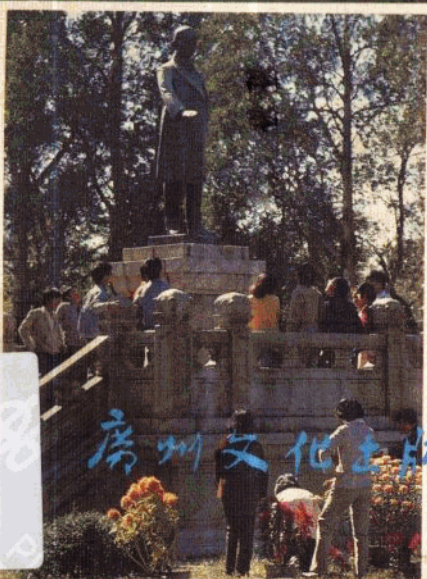




廣州的文化風格



廣州文化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对广州文化的系统考察，重点剖析广州文化生成、发展的特点，从理论高度展现广州文化的风貌。是近年来对广州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书共分9章，包括广州传统文化、广州现代文化、广州文化与中国文化圈的比较，以及广州文化的发展趋势等内容，材料翔实，观点鲜明，是了解广州文化风格不可多得的专著。

本书适合大、中专院校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教师、学生阅读，也是文化、宣传部门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

笔墨纵横写广州

——广州文化出版社《羊城书系》总序

我国的出版社，近十多年来增加了许多，形势发展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固然不应该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几千家出版社同时并存，互相角逐，进行大鱼吃小鱼式的竞争。但是，国营出版社适当增加一些，分工细致一些，却是有利于出版事业的纵深发展和繁荣昌盛的。许许多多的省市出版社采取“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就不但全国各地共同需要的书籍可以出版得多些，分外具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为某部分读者所特别需求的书籍，也可以出版得更加丰富和较有系统了。

这套《羊城书系》，是1987年成立的广州文化出版社，在建社伊始，就订下来的一项庞大计划。没有这家新出版社的成立，也就不会有这么一套丛书。《羊城书系》是知识性、资料性、通俗性的系列书。它将比较

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广州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历史为经，以现状为纬，经纬交织，构成一幅描绘广州的诸般风貌的彩色长卷。它的内容，大体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俗宗教五个方面。“书系”计划长期出版下去，每年若干册，每册不超过十万字。以风趣生动之笔，表现广州的大千事物，做到适合各方读者的需要，让人开卷有益，老少咸宜。这样的系列书，当然要约请众多的作者执笔的，一枝枝笔，合起来就像一根如椽大笔可以纵横挥洒，酣畅淋漓地为大广州立传，为名城写照了。

广州，虽然它不是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但是它同样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城，在中外关系史上，它更是首屈一指的东方名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这方面来说，它在中国大城市中，是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的。

广州，从地下发掘和历史记载看来，它的居民，没有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有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三千年前。三千年古城，它的历史地位可与西欧的罗马媲美了。接近三千年前，当今天的广州大部分市区还是浪花翻腾的海洋的时候，周夷王时的“楚亭”，就是设在越秀山脚下最早的城池，它后来演变而成南武城、任嚣城、赵佗城，……一步步地扩展，到了公元226年，广州的名字出现了，从出现这个名字到现在，也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数千年间，在大海逐渐远移，南迁一百多公里，而广州市区日益扩大的过程中，广州所辖的区域或大或小，但是越秀山麓的一片土地，这座滨海城市，始终是南国的一个最重

要的政治、经济舞台。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旅进旅退的战争，繁盛的国际贸易，好几个小朝廷的兴亡，以及各地商旅云集的热闹景况。这中间，远古的传说，古海的遗迹，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可歌可泣的史事，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壮绩，各种珍贵的土产名物，值得介绍的知识，自然是很多很多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广州，它不仅是历史悠长的城市，风光旖旎的城市，国际贸易的城市，革命传统深厚的城市而已，同时又是改革和开放的前驱。它是当代中国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而且，中国最先设立四个特区，有三个就在以广州为省会的广东省的怀抱中。因此，广州有大量的事物，在中国是得风气之先，举国瞩目的。就是广州的居民，也觉得它正在日新月异地变迁着，往往离别数月，归来时，一些崭新的楼群，就在左邻右里拔地而起了。它有不少建设项目和物品的人均消费量，已雄踞“全国之最”的地位。对于这样一座城市，不仅广州本地，全国各地，自有不少读者想加深对它的理解。这套系列书，既追溯它的历史，也描绘它的现状。纵断面和横断面都加以描绘，人们就可以对它获得全面的理解了。

系列书，打个譬喻，有点像珠串似的，分开来是一颗颗的珠，合起来就是一条珠串；它又有点像工艺美术品中的套盒，分开来，是一个个盒子，合起来，却可以组成完整的图形。想了解某一方面事物的读者可以看它其中的一两本，想全面了解它的读者则可以一本本地看它。“配套成龙”。日积月累就可以获得有关广州的丰富知识了。我想，本地和外

地读者，是总不乏要以丰富的历史、地理、博物、民俗知识来使自己学识积累更加深厚的吧。是总不乏要对我们这座古老而又青春的城市，进行深入了解的吧！

《羊城书系》，是广州文化出版社对新时期历史的一份献礼。“盛世修志”。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形式的地方志了，愿十年之后，这套丛书，蔚然形成体系，积累为独标一格的“广州文库”。

秦牧

1987年9月·广州

导 言

广州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 世纪；她作为城市面目出现的历史，也有 2000 多年了。在过去的千百年间，广州是海内外商人来往频繁的华南最大港口；近代则成为中华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开风气之先的地区；而今又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与世界交往最为密切的城市之一。她的文化经过历史的累积与淘汰形成为概括性的文化类型，使人们不容易把握她的风格特征。在本书中，我们不是想构筑理论大厦，而是想在分析广州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探求广州文化对这一进程的影响。

文化一词，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学术理论界，都用得很多而意义又很不一致。本书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接受了英国人类学家 B·马林诺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表述的观点：“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的，其所采取的方式

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文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生理器官以外的感觉。”（马林诺斯基《文化论》P.70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这一意义的文化概念，外延是很广的，以结构而言，它包括物质底层、社会组织和语言三因子；以功能着眼，它分成经济、政治、教育、法律与秩序、知识、宗教巫术、艺术、娱乐八方面。

那么，应该在哪里开始我们对广州文化的观察呢？马林诺斯基还说过：“对于文化的正确认识应当求之于一代代人类产生文化的过程，及每一代新生的机体如何受文化陶炼薰染的情形中。”

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抚育出来的人，其态度、信仰、各方面的举止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人们很容易感觉，也是研究者们热衷的研究对象。然而，同一文化传统的社会抚育出来的人，其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差异却容易为人们忽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整合程度很高的环境中，这方面的差异更不足以为研究者们所重视。但是大庾岭、骑田岭、萌诸岭、都庞岭、越城岭这五岭以北的人或许会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五岭以南的人与自己是不太一样的。这种不一样，象孪生兄弟，对外人来说，把他们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但在他们兄弟之间，差异的感觉是很清楚的，尤其是在他们长大以后，差异就更明显了。南岭以北地区的文化和南岭以南地区的文化虽然同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之间也象孪生兄弟一样，是有差别的。经过历史的沉积，广州文化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音乐、习惯和特殊的观念，这些独立性在吸收新文化因素时并没有被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传播的同化力量所消除，她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其他区域区

别开来。

广州文化与中原文化产生的差异，首先是由地域的自然隔离造成的。

由空间传播过程的时间差异引起的文化分离，演变成了广州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地域上的差别。经过历史的累积和淘汰，保留了许多文化源区已经变化了或已消失了的文化特质的广州文化，逐渐有了自己的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她对新的文化因素就有了独立的选择能力，再也不容易发生当初的同化现象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强劲不衰的活力，直接根植于同样源远流长、入化神奇的中华物质文明创造史，也发轫于自身不同区域文化子系统的争妍斗艳以及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

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汉文化是中华文化形成的先声与内核，在中华文化形成史上，中原汉文化以其先达的文明程度和系统深厚的构成，逐渐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地域文化，造就了统一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区别并没有完全消失，由于文化形成环境和主体条件的差异，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在中原文化基本精神的同化过程中仍然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和风格内容。

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五彩缤纷的中华文化圈，是由大大小小、风格同中有异的亚文化圈组合而成的：沉重、古朴、苍劲的西北高原文化；绮丽、婉转、靡情的苏南文化；浪漫、豪放、超脱的荆楚文化；阳刚、清新、宽阔的岭南文化……这些各具风格特色的亚文化圈在中华文化史的长河中

各领风骚数百年。正是各文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撞击、融合，写就了一部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史。

正如中华文化圈是由几个地域亚文化圈构成的一样，岭南亚文化圈也由潮州文化、广州文化、粤西文化、桂系文化等几个子文化圈构成。五岭之南，虽然同属基本风格相近的岭南亚文化圈，不同区域的特殊性仍然带来了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产生了亚文化圈中的子文化圈。其中，正如中原文化被视作中华文化的正宗和内核一样，广州文化无疑也最有资格代表岭南文化，居岭南文化的主流。

如果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中原文化、苏南文化的摇篮，那么，珠江流域无愧为岭南文化的母体。她为岭南文化的萌发、发展、交流提供了自然的条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是珠江流域最后的汇合点和出海点，岭南不同区域的子文化圈以其各自的精华和力度在这里汇集、融合、积淀、升华，历经广州建邑二千余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广州传统文化。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广州传统文化的根基及发展线索	(1)
第二章 广州传统文化风格要略	(11)
第一节 “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	(11)
第二节 “唯变”的宇宙观	(14)
第三节 “鼓励创新”的学术观念	(15)
第四节 “以自然为宗”的审美观	(18)
第五节 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学风	(29)
第三章 广州传统文化风格评价	(24)
第一节 广州传统文化的特质	(24)
第二节 广州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	(30)
第三节 广州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	(35)
第四章 广州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	(37)
第一节 广州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的 出发点	(37)
第二节 广州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 异同	(39)
第三节 广州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渗	(49)

第五章 广州当代文化创造及其显像	(53)
第一节 广州当代文化形成的商业土壤	(53)
第二节 广州当代文化创造的主体知觉	(57)
第六章 当代广州人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趋势	(73)
第一节 广州人习俗行为的价值	(74)
第二节 人际观的进步因素	(80)
第三节 对生活方式的价值判别	(93)
第七章 广州文化与香港文化比较	(101)
第一节 穗港两地深刻的人文联系	(102)
第二节 香港宏观文化评价	(109)
第三节 香港微观文化的特色	(117)
第四节 穗港文化风格比较	(129)
第八章 广州文化发展的新模式	(135)
第一节 新文化的特征	(135)
第二节 广州文化的新变化	(137)
第三节 广州新文化发展的条件	(141)
第四节 建立广州文化的发展模式	(145)
第九章 创造具有时代风格特征的广州文化	(149)
第一节 造就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和民族特色的 融合型广州文化	(150)
第二节 造就适应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 驱动型广州文化	(155)
第三节 造就适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多层 次、多功能广州文化	(161)
后记	(173)

第一章 广州传统文化的 根基及发展线索

文化是人创造的，而人总是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文化活动的。一定的环境造就了一定的主体的特质，由此决定了地域文化的特殊风格内容。为了领悟广州传统文化的风格，有必要首先对它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进行多角度的考察，从而认识广州传统文化产生的物质根源和客观基础。

地理和自然风貌。《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道出了地理环境对人的文化修养的重大影响。广州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首先是广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广州，古称南越，处五岭之南，与中原遥隔，其间有长江湘水之险，衡山南岭之阻。在古代，已足使达官显贵、墨客骚人视为畏途。空间的隔离阻滞了区域间文化的交流，但也为亚文化圈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广州南临南海之滨，背靠大陆，扼珠江

出海口，对吸收海外文化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晋时，华南地区的出海口的重心从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唐朝，广州已以大港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唐大和上东征》载，当时的广州河面“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番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是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域中外侨杂居，他们带来的“蕃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货物器皿、艺术珍品，成为广州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源流。

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广州地区，江河纵横，大海衔抱；一马平川，风光明媚，生机盎然。绮丽的自然风貌陶冶着广州人的气质，默化了广州传统文化的特殊风貌。

经济背景。秦汉以前，岭南的经济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史称南蛮。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原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工具，岭南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宋明以前，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航海业还无足轻重，中国与西亚和欧洲的联系主要靠河西走廊的陆上丝绸之路。明以后，航海术发达起来，广州成为华南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农业经济与海洋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商业趋于繁荣。有明人孙賡作《广州歌》为证，歌曰：“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嵒峨大船映运日，贾客千家万里宝。”到清代，外国商船抵穗更多，据统计，乾隆十四年（1749）至道光十八年（1838），外船抵港5130艘。（《粤海关志》卷24—34）海洋经济带来的商品气息，使岭南的农业自然经济注入了不可低估的活力和“杂交优势”。

明中叶以后，以提供货品为主要目的的专业化种植业开始出现。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山出现了大片的“果基、鱼塘”，“桑基、鱼塘”，专业生产果品，养殖桑蚕鱼虾。

清初，特别是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广州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经商口岸，大批外商到广州采购生丝及丝织品，大大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种桑养蚕业的发展，“弃田筑塘，废稻种桑”，相效成风，形成了以南海为中心，遍及顺德、高鹤、中山、新会等县，出现以养鱼、种桑、喂蚕、煮丝为业的专业生产区域。其时，这一地区是“蚕壮鱼肥桑茂盛，塘肥桑旺茧结实”的一派兴旺景象，初级的商品性农业经济率先形成。

与此同时，为买卖产品为目的的手工业也很快成为岭南人民的主业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造船、制糖、纺织、丝织、器具制作的作坊、工场遍布。明嘉靖后，广州已能制造出海的“洋虹”，走内河的“黑楼船”。广州附近的纺织工场达2500余家。清末，有丝厂63家、丝车34600台。盛极一时。

商品性生产的蓬勃发展，为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明、清两朝，珠江三角洲营商之风已颇盛。当时有民谣唱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缲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亦农亦商、亦工亦商成为风尚。市场、价格、交换成为珠江三角洲人们的日常话题。以至雍正五年广西巡抚韩良辅在一篇奏折中抱怨说：“在广东本土之人，唯知贪财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至民富而米少。”（《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三）冯友兰先生曾对小农与商人的生活方式作了比较，指出：“小农的生活

方式是顺其自然的。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海洋国家的商人，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风俗不同，语言也不同；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相反，为了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可见，不同的经济生活条件潜移默化着人们不同的文化特质表现。特别是当人们还不能摆脱经济问题的困扰，达到完全自觉地控制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时候，更是如此。

由于广州地处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带，以及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有道路，较早地产生了初级的商品性经济，民间也较早、较广地产生了以“重利”为特征的商品意识，正是在这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使广州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与完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原文化迥异的色彩。

人口源流。广府系人由土著越人与中原南迁人群混杂同化而成。古时的广州地区为荒芜之地，地处南陲，北阻五岭，百越诸土族据其地，言语风俗，与中原甚殊，中原人称为“南蛮”。春秋战国时期，与楚国来往密切，至今仍有楚人遗风。

中原南迁人群是广府系人的主流。历史上中原人有四次大规模南迁至粤的经历。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发诸当逃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见《史记》）嗣复发卒 50 万人戍五岭。这是中原人群向岭南最早的一次大迁移。然后是汉初。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南越武王赵佗死后，宰相吕嘉反叛，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率数十万大军南征，平定叛乱，并留守

岭南九郡。此时，中原人在岭南的地位开始稳固。第三个时期是北宋末年，在战乱中，高宗仓皇南渡，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走岭南，散居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第四个时期是南宋末叶，蒙古军大举入侵中国，中原一些大夫（如文天祥、陆秀夫等）及大批庶民随帝逾岭南下，失败后流散定居于珠江三角洲。历代迁居岭南的中原人群为开发岭南地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上可见，广府系人口的构成史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开拓业迹，也渗透着国破家难的斑斑血泪，还杂拌着个人官场失意潦倒的怨恨之情。广州人构成的历史特点导致广州特有民俗的形成：

淡泊政治，厌惧争斗。逃避政治忧伤、动乱、争斗，追求和满足于安定平和。

对经济开拓富于创造性。他们从经济繁华的中原古国来到荒芜贫困的南陲蛮邦，有信心、有能力靠自己的才智开辟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勇于创业，勇于开拓。

对政治争斗权力的畏惧与反感，使他们渴望增强经济地位。迁徙和白手创业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创业的实践排斥了守旧和空谈，经典不再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效用被视为最高的价值尺度。千百年来，这些民俗风习凝集成为广州人自有的人生观念。

广州传统文化的发展线索。由于广州的地理自然环境、经济背景、人口源流诸因素，广州传统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百越文化到移民文化和广州近代文化三个阶段。

百越文化。秦以前，广州文化的主体是百越文化，亦即